

第一编 德国

导 言

伯顿·克拉克

我们对五个国家的分析从德国开始。在德国，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的早期联姻首先导致以科研为基础的大学的发展。盖勒特 (Claudius Gellert) 着重讲了科研、教学和学习的统一——即通过科学进行教育的洪堡理想的最初的含义，以及后来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以这个崇高的理想的名义而发展的许多实践的演进。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把学科而不是学生放在他的概念的中心。教授和学生必须携起手来探求新知识。不管这个中心学说后来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转变，实际的结果是一系列大学适应了学术研究。在 19 世纪后半叶，德国的许多大学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从其他国家吸引了许多学生和访问学者，他们力求学习最新的研究方法。许多大学专心致志于专门的科研和培养科研专家，高级教育获得了充足的科研基金。

但是，这个古典的精英制度在 20 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受到了冲击。在 20 世纪头 30 年间，主持讲座的教授牢固地占据的权力，加深了来自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垄断的封闭的学术寡头统治的僵硬性。然后，法西斯时期丧失了大批人才，否定了

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1945年，出现了腐败的教授职位的合法性的深刻危机，一切对智力卓越的要求全都消失。德国官方和学者刚使大学部分地恢复到希特勒上台前所拥有的精神素质和能力 就出现 20 世纪 60 年代的高等教育大发展 即进入大众化的高等教育。盖勒特详细地评论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期高等教育扩张到五倍的影响：作为政府所喜爱的迅速扩大的“非大学”部门高等专门学校（Fachhochschulen）的发展；为实际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或一半设计的许多大学极度拥挤；伴随着的教授职责从科研到教学的转移 在大众化的大学中学生越来越不相识 特别是在只有薄弱的课程组织 而且很重视成年学生在许多学程、专业和大学之间前进的能力的历史性结构的大学。

纯粹科研和应用科研的从大学流转到如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 筹其他机构 是对科研和教学统一的另一个威胁。如果说洪堡的遗产在德国是一份常常被谈论和称道的显示倔强性格的遗产 德国的大学在实施时却是一片混乱 而这个古老的理想也许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妨碍。德国大学努力在各大学之间和大学内部实现活跃的分化，使它们即使在其他地方明确而完全地放弃这个理想，在某些地方也维持科研、教学和学习的统一。

所以 德国高等教育在当代 在分化和支持大学训练的高级层次方面正经历着相当的困难。但是 在学府内外 对科研的承诺根深蒂固。斗争在于寻找能使这种承诺密切地与教学和高深学习联系的组织和资助的模式。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盖勒特所写的有关德国的两章有很多话要说。

第一章 德国科研和高级教育的模式

克劳迪亚斯·盖勒特

科研和教学统一的传统在讲德语的高等教育领域已长期存在。科研和教学的统一(Ein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规定着大学教师的专业任务，他们的教学将密切地和他们进行中的科研结合，而且直接地建立在他们进行中的科研的基础之上。大学教师应该永远专心致志于科研，他们各自的科研活动的具体的见解和成果，应该直接地成为他们教学的财产。再者，大学教师有义务进行科研，其成果应立即用于教学的目的。要了解这个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必须考察这个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洪堡理想的产生和发展

在19世纪初，德国的历史背景是由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决定的，又是间接地由法国革命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决定的。从1792年至1807年，大多数德意志的公国在和法国作战。在近1800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地主的领地中，有少数是重要的欧洲强国，但是多数只是独立的城堡和村庄。若干和约只构

成短暂的停战期。普鲁士是设法避免1795年至1805年之间的战争的极少数德意志邦之一。在1806年普鲁士试图向法国挑战，但很快被打败。从而拿破仑能够实现他在中欧建立一个有若干互相中立化的中型主权国家的十分平衡的权力结构的计划。在莱茵河以西的德意志各邦被法国并吞，很多小公国特别是“教会邦”、大寺院和大主教管区与最强大的王朝合并。在有些情况下，疆界是被十分武断地划定的。从而在1807年，过去的哈普斯堡帝国已经被消灭，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这在英国和法国很早已经发生，在德国被推迟了64年。

与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相对照，德国的资产阶级那时在全社会中还比较弱，在政治上还缺乏组织。来得太迟的工业化和缓慢的经济发展，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各公国的改组以及各君主国和容克资产阶级的持续的专制统治中，有助于形成一种以不断的动乱、危机和缺乏民族个性为特征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气氛。虽然在理智上觉醒，但地位低微和政治上无权的中产阶级还留在基本上属于封建的框架之内，在艺术、文学和哲学中寻找它的身份。受过教育的教士、教师、高级公务员、大学教师和诗人不愿或不能为政治解放而斗争，但企图在社会上和贵族阶层同化，倾向于期待“开明君主”的改革。

当资产阶级在它们的文学和哲学中创造一个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景，一些自由主义的普鲁士高级行政官员能进行使新兴的资产阶级配备有限的自由和自治的时候，开明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 *Bildungsbürgertum* 缓慢地完成了较多民族方向的文化。正如本大维 (Joseph Ben David) 和兹洛佐沃 (A. Zloczower) 在合著《近代社会的大学和学术系统》一文中

所说的：“提倡以前鲜为人知的德国文化而不是法国文化 现在变成甚至影响受过法国教育的上层阶级的大众的意识形态。有一种感觉认为民族的真正力量存在于精神和文化的领域。”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发展 对一所德国新大学的未来的观念具有重大影响。在 18 世纪，德国教育已有相当大的进步 贾曼 (T. I. Jarman 在《教育史的里程碑》一书中说：“在学院的有教养的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一种新的精神进入哈列 (Halle) 和格廷根 (Göttingen) 这类近代大学。”当时许多大学成为对智力活动和政治感兴趣的资产阶级比较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同时，多数大学在许多方面还是过时了。本大维在所著《学习的中心》一书中把它们描写为“被法律、神学和医学的职业性学部所主宰的传统的大学，它们不允许真正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因为它们常遭国家和教会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主要的普鲁士行政官员 如杰出的洪堡 他受到了法国的政治事件和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影响，深信只有在有理性和知识的公民的协助下，国家和社会的理性发展才有可能。

唯心主义哲学源于康德，但是它超出了康德。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施莱埃尔马赫 (Schleiermacher)、费希特和施雷格尔 (Friedrich von Schlegel) 坚持认为世界能从现实的先验的概念化推演出来。他们相信存在和人 (客体 and 主体) 的二元论。世界在理论上的理解只能在普遍的或绝对的认识中发现“实践” (praxis) 被看做一个相对的变量 现实的组织能从这种绝对的认识推演出来。根据唯心主义者所说，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和析“真理本身” (truth as such)。因而，一切学术研究和科研 (Wissenschaft) 被唯心主义者解释为哲学。

他们把‘Wissenschaft’概念化 作为按照绝对的认识组织现实的道德的和实际的义务，发现这种认识的地方就是大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大学仍须训练学生成为公务员、教师和医生，但是这种训练必须采取一种明显的无目的的寻找真理的过程的形式。学术共同体被费希特解释为一个理性社会的范式 因而它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的理想的共同体”。18世纪的学院和职业学校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需要。和这种制度相对照，新的大学的概念旨在自由地和独立地决定它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在所有尝试这项任务的理论家和行政官员之中，在把这些理想转变为创办一所新大学的具体计划方面，洪堡是最成功的。就洪堡来说，在实用的职业教育和以纯粹的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普通教育之间 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两种教育模式决定于不同的原则。普通教育意在加强、尊崇和指导人本身 专家教育将只提供实际应用的技能。”

新的大学必须根据这种区别进行改组 普通教育“纯粹的 科学观念”必须予以头等重要的地位。所以 按照洪堡的设想 必须这样进行改革 使学生和教授能追求这个永恒的目标——“真理本身”，因而能凭这些理性原则改革国家和社会。洪堡称这种教育计划为通过科学进行教育（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对于洪堡来说，这种教育也必须对教师和学生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师生之间传统的权威关系必须为不同认识水平的学生之间的非命令式的、自由的合作的观念所代替：“大学教师不再是教师 学生不再只是学习 而是学生自己进行科研 教师只指导和支持他的科研。”

当威廉三世于 1809 年为柏林创办一所新大学时 这所大

学就是根据洪堡的这些概念而设计的。学科而不是学生首先受到注意。洪堡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化。前者并非为了后者而存在。他们在大学都是为了科学和学术。”既然寻求真理不应由于时间、即时的职业目的或国家的控制而受到限制，必须使教师能够教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也必须使学生能够学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这就导致对教授实行科研和教学统一的原则，因为教学内容必须是持续不断地寻求客观知识的直接反映。相应的原则适用于学生：“学习的自由”允许他们从各种不同学科所提供的材料中自由地选择，当他们喜欢的时候可以变换大学，当他们感到准备好考试的时候参加毕业考试。这个原则后来被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他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学生的各种证书以表面价值得到承认，他能够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从而，如果他愿意，到拥挤不堪的柏林，尽管图宾根（Tubingen）可能对他更合适。他选择他自己的教师；他从一所大学漫游到另一所大学；他也许以击剑或饮酒浪费他的时间；他也许为了在一个实验室或诊所当助手而在放假前离开学校。在职业训练中，学习有逻辑的顺序，他也许听从劝告或忽视劝告，自己承担风险。从注册之日起，他就被当做一个人对待。”

在以后的年代里，其他德国大学继续按照新的原则进行改革。两所新大学——创建于1811年的布雷斯劳大学和创建于1818年的波恩大学直接采取柏林大学的模式。18世纪的过时的大学模式到处土崩瓦解。在1794年至1818年之间，在德意志境内20所大学（主要是天主教大学）被解散。在有些情况下，这只是一种形式，因为多年来这些大学已经没

有任何学生或教授。前一个世纪的狭隘的教派方向的结构被比较开放、自由和学者风度的安排所取代。保尔森 (Friedrich Paulsen) 出色地概括了在 19 世纪初出现的一所德国新大学的理想：“它的原则必须不是一致和从属，而是自由和独立。教授必须不是从事教学和考试的国家官员，而是独立的学者。教学必须不是按规定的顺序进行，而是以教和学的自由的观点进行。目的不是百科全书式的信息，而是真正的科学文化。学生不是被看做仅仅作为国家官员为将来服务作准备，而是被看做年轻人 通过不受限制地学习科学 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理智和道德的自由。”

成功的模糊性

19 世纪早期在柏林创办的大学震动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本质上属于中世纪的许多大学相应地尽一切可能仓促地将自己近代化。普鲁士带头，以其疆域之广，大学数量之多，处于盟主地位。

德国大学在 19 世纪的实际发展中 在某些方面证实了早期改革家的意图，证明他们的思想是成功的。大学在迅速的工业化过程和资产阶级的日益增强的作用的支持下，为社会和经济选定了新的任务，使它们转变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这种思想如此成功，以致以它的名义建立的新的大学结构和实施在整个 19 世纪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大学的哲学部成为最重要的学部，因为它包含了在 19 世纪取得巨大进展并走向高度专门化的整个范围的科学的各学科。同样重要的是，哲学部成为培养师资的场所。1810 年，*Examen pro facultate docendi* 决定所有中学教师均应通过学

术考试。这不仅仅是许多学科国家考试的开始，而且提高了教师的威望。结果 学生都面向毕业考试 同时制定了明确规定的课程纲要。

大学的入学办法也在早期就制定了规程。在 1812 年至 1837 年之间，大多数德国的邦采用中学毕业考试 (Gymnasialabitur) 作为文科中学 (Gymnasium) 的毕业考试。离校证书 (Abitur) 很快成为大学入学的必要要求。文科中学要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但是在深度上要使每一个中学毕业生 (Abiturient) 能在任何大学学习任何学科。像在法国那样，德国文科中学的普通教育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和一些化学及生物。

由于近代德国大学规定要提供共同寻求真理的论坛，除讲课外，增加了研讨班作为学习的一个主要形式。大学以科研为方向和学科的越来越专门化，导致实验室的建立和大学工作人员的分化。教授有助教帮助，同时大学被逐步分成进行专门化研究的研究所。随着国家考试和其他大学学位的推行，传统的博士学位不再具有像中世纪那样可以到处进行教学的权利 (jus ubique docendi)。在 1816 年至 1838 年间 柏林开始推行大学讲师资格 (Habilitation) 制度，从而成为能在所有大学担任教学工作的正式资格。结果，已经通过讲师资格考试、正等待讲座职位的不领薪水的非正式雇用的教员 (Privatdozent)，成为德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很多非正式雇用的教员不得不任教 否则永远得不到教授职位 这使得大学工作在社会上成为有高度选择性的职业。非正式雇用的教员的制度也扩大了教授 (Ordinarien) 的权力 因为教授决定谁能获得讲师资格和谁能赢得实验室及诊所的职位。

19世纪德国大学的声誉和对其他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来自德国大学在高度专门化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正如本大维注意到：“直至大约 19世纪 70 年代 德国许多大学实际上是世界上一个学生能获得如何进行科学和学术研究知识的唯一的机构。”阿什比 Eric Ashby 在《十九世纪大学的理想》一文中说：“德国的大学成为西方世界的骄傲。例如，在德国吉森 (Giessen) 的李比克 (Liebig) 的实验室里，有来自整个欧洲的学生一起工作。每个学生得自己设法到吉森。李比克和他的学生从拂晓到深夜都可以在实验室找到。”对学生而言，并没有可以帮助他们更广泛地发展个人的指导或咨询以及非正式的接触或课外活动。一切都适合学术研究。大学作为科研中心是新的理想。

德国大学制度为发展到国际学术的最前线付出了一些代价。例如，洪堡有关学术研究的不加指导和自由地进行的思想在 19 世纪后半叶被严重地歪曲。学术界的唯理智论取代了他的通过科学进行教育的人文主义的理想。对学生提出的理想不再是渗透柏林新大学的自由的人文主义。替代它的乃是对推进知识的专心致志的几乎是狂热的承诺，排除了哲学、实际的应用和任何为生活而教育的思想。

而且，如果按照传统的理想，哲学部旨在为不受国家干预、无限制地和自由地追求知识和寻找真理提供一个基础。19 世纪的最后 30 多年的一个特征，乃是科研越来越导向军事和工业的需求。1871 年以后，国家对军事科研的支出占帝国全部科研开支的三分之二。到 19 世纪末 私人经济利益卷入许多学术研究计划。

最为重要的也许是，19 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国际声誉、掩

饰了教授们独断专行地统治的研究所的等级结构和权力主义的特征。多数教授不仅成为俾斯麦式的政治和德国帝国主义的保卫者，而且在他们的学科内部宣扬权力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倾向。正如普拉尔（Han Werner Prahel）所说：“战前时期的德国教授在大学以内权力是很大的（教授统治）在大学以外多数教授往往屈从统治精英。”当时多数教授与地主和正在发展的实业家组成反对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非官方的同盟。在完全以科学或学者的词语解释一切的态度（Wissenschaftlichkeit）的掩护下许多教员和有学衔的行政人员都是权力主义国家的坚决支持者，而且放肆地反抗可能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社会运动。多数政党能够派教授去议会。1915年当1300名以上教授和知识分子签署一份赞成官方的战争目的，特别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征服西欧和东欧的邻国的声明时，德国教授对现存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支持和对威廉政权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只有少数大学教师反对这些目的。

因而洪堡的人文主义的大学理想在很多重要方面被歪曲。大学在双重意义上变成国家机构——它们不仅被国家直接统治，它们现在也是政权的忠诚的支持者。洪堡理想主义设想的德国大学的科研功能在19世纪末被它的导向工业和军事的需求歪曲了。洪堡的教育意图（通过科学进行教育）未能顺利贯彻。相反，原先打算培养能够对国家和社会的合理组织作出贡献的开明和自由的公民，自由地追求知识和寻找真理，被和威廉政权的目的联合传递政治文化的具有等级结构的大学的社会化影响所取代

20 世纪的艰难历程 :1900—1960

政治和文化的遗产也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大学制度的命运。德国根本上受到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影响 包括经济指标的大幅度下降、大规模的失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战败的痛苦 以及一般地缺乏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大学也发觉自己处境困难。多数教授支持的政权的失败，应该有了批判地反省的足够的理由。但是这种理智上的澄清并没有发生。大学继续再造权力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等级制的学校形式。

从 19 世纪的后一段时间起，德国大学的大多数教授把自己看做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他们把学者作为个人的政治活动 与他们作为教授的作用 权威性公开赞扬科学客观真理之间区分开来。这并不阻止他们之中许多人支持右翼的政治纲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的等于民主的等于非客观的和非学术性的”这个等式 成为允许德国教授既支持他们时代的反民主运动 又解释他们的“非政治的存在”的理由。事实上 所谓“非政治的”意味着拥戴德国统治阶级的权力 也拥戴德意志帝国对其他国家的权力。例如，在 1918 年 著名的小说家托玛斯·曼就表现了这种对无政治意义的存在的思想观点的信念：“我承认 我深信德国人民将永远不会热爱民主主义 仅仅因为他们不会热爱政治本身 对德国人民来说 被名誉扫地的权力主义国家 *Obrigkeitsstaat* 统治乃是最合适的国家形式 最有利的国家形式 而且是他们最想要的国家形式……。这个外国的和令人作呕的时髦话‘民主’滚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废除军国主义君主制度以后，德国

大学和它们的教授没有试图检查一下导致政治灾难的原因。大学经常地庆祝在 1871 年 1 月 18 日发生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宗泰默 Kurt Sontheimer 指出 在这些庆祝会上发表的演说通常包括三个主要话题：帝国光荣的过去和共和国悲惨的外貌的比较，重建帝国旧时光荣和权力的愿望。呼吁学生恢复这失去的伟大。

这类活动一定鼓励学生憎恨魏玛政府和社会民主运动。大多来自上层中产阶级的学生已经在家庭采纳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反民主的偏见被他们的教授们所强化。1920 年建立的德国学生联合会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基本上是国家主义的和反犹太人的。主要从事喝啤酒和击剑活动的反动的学生联合会 (Korporationen) 对学生的一般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些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经常歧视和迫害犹太人大学教师。1931 年时 德国学生联合会有半数成员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合会 (NSDStB) 接管了组织的领导权。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NSDAP) 掌权以后，学生在德国精神的出现 (Aufbruch des deutschen Geistes) 的口号下 在所有德国大学组织了一次大会。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实业家和保守的上层阶级的大力支持下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不断地争得权力和议会代表资格。他们公开宣传他们反民主的、反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口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成百万册地出售。因而有关新出现的政权的政治意图，没有多少可疑的。希特勒的政治口号包括他的种族思想，也被许多大学所接受。在 1933 年希特勒争得权力以后，大学没有多久就适应了新的形势。1937 年，希特勒在格廷根发表的一次演说暴露了对科

学和学习的新的理解：

我们抛弃国际的科学。我们抛弃国际的学问共和国。我们抛弃为科研而科研。我们教医学和学医学，不是要增加细菌的数量，而是要使德国人民保持强壮和健康。我们教历史和学历史，不是要说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而是要使德国人民了解过去。我们教科学和学科学，不是要发现抽象的规律，而是要磨快德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竞争的工具。

在纳粹德国，大学已不再是原先意义的大学（universitas）。许多大学蜕化成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机构。对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真理是由“优秀种族”（Herrenvolk）界定的。正如纳什（Arnold Nash）所说：“一种思想的惟一的真理标准是它是否在德意志种族，或者无宁说纳粹党，在它权力而且更多的权力的不能扼止和贪婪的渴望中为它服务。”因而，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任何一套思想的真理，不是按客观事实理解，而是由领袖体现。

因为大学像任何其他机构一样，在每一方面都受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学术的原则决定了大学生活。在行政的层面，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的采用意味着教授和学生的管理权力被完全排除。教授和学生分别组织成“教联”（teaching - corps）和“学联”（student - corps），各自有一个“领袖发言人”。他们接着直接对作为“大学领袖”的校长负责。没有一个官员是选举产生而是由教育部长任命。早在1935年3月，大学被迫参加国家社会主义者军事计划，它们被指示协助灌输它们的成员“防御意识”（Wehrhaftigkeit）的观念，课程重新组织，使“防御科学”优先于一切其他学科。

假定在1933年以前，大多数大学教师支持国家社会主义

者 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不关心政治的”大学 应该在很大程度上 对后来变成公开恐怖的 多数学生不仅断然接受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接受一般反民主的思想负责。尽管他们的很多同事因为政治和种族主义的原因被开除，很多教授很快参加到新的形势中去。他们被民族‘革命’所迷住，认为他们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迅速复活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迅速消灭的希望得到实现。在第三帝国彻底崩溃以前，这种情况没有被废除。

德国大学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的牺牲品，一部分因为它们不加批判的和沙文主义的价值观几乎把所公布的摧毁魏玛政党制度和在国内外恢复德国实力的政策合法化。在 19 世纪早期，大学必须根据唯心主义哲学的人文主义原则自由地发现真理。这个机构已经成为以下一种幻想的牺牲品，即对科研的狂热忠诚（伴随着忽视作为这种机构的极其重要的指导功能的一般的自由价值观）能够维护它的创始人的原则和理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学改革

1945 年后，德国大学的重建以一系列特殊的结构和规范的问题为特征。这些问题之一在于想重新设置一个独立的科研功能，即防止政治的干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学及其成员的政治和道德的失败。与第二个问题有关的第三个问题是科学专门化的程度，这在过去似乎导致大学忽视诸如提供适当的专业训练和人文主义的、政治上开明的普通教育（Allgemeinbildung）的基本关注 结果使战后大学的争论集中在这个未来毕业生的人文主义和政治的普通教

育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改革运动应该摆在那个背景上。这个运动的基本意图被概括为一个口号 即反对被认为危险的专门学 (studium speciale) 而进行全面学 (studium generale)。他们认识到 专门家在他们学科的狭窄的范围内知识渊博 但不能把他们的知识融合到宽广的社会构架及其伦理的和政治的必需中去 这样的专家乃是传统大学训练的产物。相反 他们证明 社会需要洪堡所设想的受过真正和全面教育的毕业生。所以 全面学的运动导致为学生设置学舍 (collegiate homes) 并开设包含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宽广的基础课的课程。

但是，全面学运动既没有成功地在大学造成更好的交往和相互影响的模式，也不曾导致对结构改革的认真反思。这个运动并没有揭露德国大学历史上教学和科研组织的压迫的和非民主的性质，反而转移了对重要问题的注意。哈伯马斯 (Jurgen Habermas) 这样总结当时的形势：“那时 大学以在政治上扩大其传统的自我认识进入民主社会 但是 要不然 它还是老样子。”

德国大学的教授一直完全负责他们学科领域的全部教学和科研。他们亲自负责分配他们各自的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因而他们不仅决定大学某一部分的学术发展，而且也有权威地统治研究所的所有其他成员。研究所这种独裁体制引起成问题的依赖关系，并且导致韦伯 (Max Weber) 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存在 (proletarische Existenzen)。韦伯主要指等级较低的教师 (Assistenten)，他们往往数十年在组织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依赖一位教授。

这种事态基本上保持不变，而且是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

